

中國翻譯教學現狀初探

穆 雷

海南大學文學院

翻譯課在教學大綱裏是大專院校外語系不可缺少的必修課，大家也逐步認識到翻譯課的重要性，然而翻譯教學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翻譯課並沒有真正得到它應有的地位。這一點恐怕不少翻譯課教師都深有體會。本文就從翻譯課的安排、教材、教師、教學方法和教學研究等諸方面對翻譯教學現狀(主要指漢英互譯或英語系)作一初步探討。

我們沒有對全國所有外語院校的開課情況作過全面的調查，只是就各種類型的院校作過小規模的了解，基本上是各校翻譯課教師提供的信息。據了解，絕大多數外語系都開設了翻譯課，課程主要有漢譯英和英譯漢，有的學校分口譯課和筆譯課。其中漢英、英漢翻譯分開教學的較多，從 1977 年以後各校均陸續開出筆譯課，但口譯課開設尚不普遍。一般院系是在大三開設英譯漢一年，大四開設漢譯英一年，每周二學時，也有在三下四上集中一年安排的，還有大三開一年英譯漢、大四開半年漢譯英的，不一而足。各校開課沒有統一要求，大都根據本單位教學總安排和教師情況而定，因此有些安排並不十分合理。例如有的學校先開翻譯後開高級寫作，學生的英語寫作尚不過關，漢譯英時就出現許多問題。又如有的學校不開文體課，學生對各類文體沒有感性認識，翻譯課講到各類文體的翻譯時就要遇到困難，影響進度。有的學校每周四學時，有的卻隔周上課。究竟怎樣開課比較合理？用多少學時比較合適？這些問題還需翻譯教師在一起討論決定。

由於各外語院系培養目標不同，因此各校選用的翻譯教材也各不相同。例如外語學院和綜合大學的外語系主要培養綜合性外語人才，有些新設立的國際經濟、金融等雙學歷的系培養的是有經貿專業知識的外語人才，不少理工大學和醫學院為本行業、本系統培養科技翻譯和醫學外語人才，部隊院校則偏重培養軍事外語人才，等等。一般來看，凡是有明確非英語專業培養目標的院系，大都以自編教材或講義為主，以統編教材為輔或根本不用統編教材，以適應特殊培養目的的需要。培養綜合性外語人才的單位也有的選用自編教材，但內容沒有明顯的偏向。還有不少院系，把統編教材《英漢翻譯教程》與《漢英翻譯教程》發給學生作為教學參考，讓學生自己看，教師自己則補充許多內容。總之，經過調查發現，已經很少有教師只使用這兩本統編教材了。

這說明，經過十幾年的使用，這兩本教材雖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已逐漸不適應新的形勢，重編統編教材勢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應該組織人力根據不同方向的需要編寫內容側重不同的新統編教材。在編寫過程中，應將練習答案和教師參考書等配套教材分開處理，像《大學英語》那樣成龍配套，方便教學。還應附加一部分練習，供能力較強的學生自學自練。

近幾年來，各地陸續出版了一些翻譯教材，都是翻譯課教師結合自己所在學校的培養目標和教學經驗編撰的，如何平的《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楊莉黎的《英漢互譯教程》、郭著章的《英漢互譯實用教程》、唐連成等的《英漢翻譯教程》、王宏印的《英漢翻譯綜合教程》、古今明的《實用英漢翻譯教程》、李正中等的《新編英漢翻譯》和陳宏薇的《實用漢譯英教程》等。這些教材都有自己的特色並在一定範圍內使用，但還沒有一本大家普遍認可的、可以作為統編教材範本的著作。原因一是由於各類院校培養目標不同，只能分別編出不同種類的統編教材，不可能一本教材「一統天下」；二是教師各自對翻譯理論與教學實踐如何結合都有自己的看法，上述教材大都體現了編者的翻譯觀，比較突出的如何平的教材以他潛心研究的符號學為指導，陳宏薇的教材則反映了她所堅持的社會符號學的翻譯觀，還有像楊莉黎的教材那樣廣泛介紹和應用現代翻譯理論的重要觀點的，等等。如何在教材中體現理論的指導？本科教材中理論應佔多大比重？怎樣把理論滲透到教學中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只有就這些問題達成共識，才能編出一套或幾套大家都願意採用的統編教材，改變目前這種狀況。

翻譯課教甚麼？怎麼教？這是一個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翻譯課教師基本上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本科階段的翻譯課應以實踐為主，也不能完全不講理論。但究竟怎樣去做呢？按照《高年級大綱》的要求，翻譯課既要講翻譯理論，又要有大量實踐；既要研究漢、英兩種語言的對比，又要總結常用的語際翻譯技巧。我所接觸的同行中的大部分已經認識到，只實踐不講理論不行，只講理論不實踐也不行，應該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講一些翻譯理論（包括翻譯簡史和翻譯標準等內容）。《高年級大綱》規定的第六級的翻譯要求是：能運用翻譯基礎理論，初步熟悉漢英兩種語言的對比，並掌握常用的翻譯技巧。第八級的翻譯要求是：進一步通過英漢兩種語言的對比，掌握英譯漢和漢譯英的翻譯理論和技巧。這些規定都比較籠統，翻譯理論和翻譯技巧內容豐富，在我們有限的課時裏，哪些應該重點講解？哪些應該一帶而過？哪些可以省略不講？學生至少應該掌握哪些內容？這些都需要翻譯教師一起來討論確定，同時應在新的統編教材中有所體現。

翻譯課的教學內容應該與其他課程協調、銜接起來。例如文體修辭和高級寫作等課程若不及時開設，翻譯課就要花很多時間來介紹這些內容，糾正學生寫作課應該糾正的錯誤。不少翻譯教師都感嘆道，我們批改翻譯作業，實際上大都是在改正學生的語法、拼寫和邏輯等錯誤，根本顧不上翻譯技巧，更談不上修辭文體。為了說明一種

翻譯方法，最好是列舉幾種方法進行對比賞析，可我們的教材裏完全沒有這一內容，我們的學生則多次要求增加不同譯文對比賞析的內容。我們可以考慮專門編寫一本以賞析、評論為重點的輔助教材發給學生，由教師指導使用，課外閱讀為主，提高學生對不同譯本、不同文體的欣賞水平，就像文學課有作品選讀來與文學史配套一樣。袁錦翔編的《名家翻譯研究與賞析》作為教學參考還是不錯的，如能在此基礎上結合教學需要，專門編寫一本與統編教材配套的《翻譯賞析與翻譯批評》之類的輔助教材，或在統編教材的教師用書裏增加賞析內容，就更適用於教學了。劉重德曾建議，增開選修課或講座，我們可以把某些翻譯理論專題討論放到講座裏去講授，把譯文賞析和批評等內容放在選修課裏去進行，這樣既能保證翻譯課主幹突出，又能彌補課時不足和內容欠豐的缺陷。此外，假如把精讀教學中的某些難點或有特色的段落及其參考譯文作為翻譯課的譯例進行講解或練習，既可以提高學生的翻譯水平，也可以反過來加深學生對精讀課文的理解，課文對譯語文化的介紹也有助於翻譯課的講授。

在教學過程中，測試是一個重要環節。然而，翻譯測試至今都極少有人問津，這大概與翻譯課本身就不受重視有關。劉潤清主張，語言學習的初級階段用不著翻譯測試，到本科高年級，先設翻譯課，比較系統地講解翻譯理論和技巧之後，經過多次練習，再出現翻譯測試。這時，漢譯英的材料必須是出版物上選出來的自然的漢語，決不用修改過的文章。英譯漢的材料必須是從英語原著上選來的、未經簡化的文字。漢譯英測試學生的英語水平和運用能力，英譯漢測試學生的理解能力。漢語表達能力不應列為測試重點（以翻譯為專業的學生則另當別論）。測試重點始終在英語。翻譯測試的試題設計至今沒有見到專門的討論。筆者曾看過一些學校的試題，大部分是把句子翻譯和段落翻譯結合起來，有些學校的試題還加上一點理論和技巧方面的問答題或選擇題。翻譯課雖然不像大學英語課那樣進行大規模的測試，但因每個外語院系每年都有學生要進行翻譯測試，我們也可以逐漸搞一點「試題庫」之類的東西，各校可根據實際情況從中挑選部分試題使用，使翻譯課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測試標準。測試重點雖在英語上，但漢語水平也不能降低要求，因為在英譯漢中學生的理解能力要通過漢語來表達；在漢譯英中，原文都不理解又怎麼談得上用英語準確表達？關於試題選材，我們完全贊同劉潤清的主張。關於翻譯測試的評分問題，的確還沒有理想的解決辦法。其實翻譯測試從英語學習的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一直都在使用，從單句到篇章，由簡到難。只因為翻譯測試的主觀性較強，所以才不好評分，全憑教師掌握。誠然，已有教師就譯文的評判進行了研究，力求找出相對而言比較客觀的辦法，但主觀性如何與客觀性結合起來還值得研究。如果我們搞試題庫，不妨讓設計者根據翻譯教師的經驗每題多設幾種參考答案，同時考慮到使用各種翻譯技巧和方法時會出現的情況，使評分時有所依據。總之，應該加強對翻譯測試的研究，使它能夠適應翻譯教學的需要。

從教學層次上來看，我國的翻譯教學以外語專業本科生為主體，大專和碩士比較

少，翻譯專業的博士生更可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國家正式批准的「翻譯理論與實踐」專業碩士點只有幾個，博士點就更少，很多翻譯專業研究生都是在英語或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學專業中的翻譯方向上學習。翻譯專業的人才培養不能形成合理的層次和系列，這種狀況無法滿足我國經濟建設對各類翻譯人才的大量需求。另外，據調查，目前我國擁有幾十萬之眾的科技翻譯隊伍，其成員主要有兩種，一是外語專業畢業生，二是專業學生。這兩種成員都有「先天不足」之處，需要經過若干時間的培養和實踐才能逐步適應工作。翻譯教學改革應該注意到這一現象。我國的理工農醫和文科各類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通過國家四、六級大學英語考試或相應的其他語種考試後，有的學校為他們開設了專業外語閱讀，在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開設翻譯選修課或翻譯知識講座，使他們具備初步的翻譯能力。外語專科學生接受的翻譯訓練就更少，一般都是在語言學習中翻譯幾個句子，用以鞏固學過的語言點。有的「翻譯學院」的課程表中根本就看不到翻譯課程，或者只有「翻譯理論」幾個字，而大量開設金融、財會、經濟等方面的課程。誠然，民辦學校為其生存考慮不得不大量開設一些實用課程，但既為翻譯學院，就應把翻譯人才的培訓作為重點。何況沒有漢外互譯的實踐課作基礎，翻譯理論從何談起？這些年來，一直有人呼籲成立國家承認的、正規的翻譯學院，或在外語學院成立翻譯系，以培養從大專到碩士、博士的系列人才。由於各種原因，這還始終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而已。

我國的翻譯教學起步於五十年代，但在各種外語教學史和大事記之類的文獻中，很少有筆墨涉及翻譯教學。近十幾年來，翻譯教學的情況的確有了很大的改觀。據留學海外的翻譯教師說，中國大陸的翻譯課程從總體規模上來看，比起美國和離不開翻譯的加拿大要普遍得多。例如在美國，翻譯通常只是一門選修課，只有幾所大學設有翻譯課程，而且大多不是學位課程，有點像我們的培訓班，結業後發一張證書。但是我們也看到，香港的翻譯教育比我們要普遍，香港的幾所大學幾乎全部設有從大專到研究生各種學歷、各種層次的翻譯課程和翻譯系，圍繞著英漢互譯（包括口譯、筆譯）課程還開設大量的相關課程，很值得我們學習。口譯在美國的翻譯教學中佔很大比重，許多培訓班都是培訓口譯人員的，特別是法庭翻譯。加拿大的翻譯項目大多為政府培養實用翻譯人才。我們則是筆譯課十分普遍，口譯課只限於部分院校；而且外語院校翻譯人才的培養方向大都不夠明確，以通用型佔多數。各類專業翻譯人才都是在工作實踐中確立方向的。在幾年前的一次全國外語院校的英語技能電視競賽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幾所外語院系的學生在現場口譯比賽中已經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水平。總的來說，翻譯教學的現狀還不夠令人滿意，存在著包括上面提到的課程安排不合理、教材老化、教學層次單一等諸多問題。筆者曾經看到，一位畢業於我國某著名外語大學、現在外資企業當翻譯的青年，連介紹自己的英文簡歷都有許多語法錯誤，口筆譯的速度倒是練出來了，但質量可想而知。當然這只是個別現象。從整體上來

說，經過近半個世紀，尤其是近十幾年來的發展，中國的翻譯教學已經初具規模。絕大部分外語院系都開設了翻譯課程，各大語種都有自己的統編翻譯教材，翻譯教師的素質逐漸提高，外語畢業生的翻譯能力也越來越強。

在漢譯英和英譯漢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一)工作態度：對翻譯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清，馬馬虎虎，譯完了事。幾乎每屆學生一開始學習翻譯課時，都會草草交上作業。因此，教師一定要強調從開始就培養學生嚴肅認真的工作習慣，作業要一絲不苟，書寫工整，標點符號清清楚楚，拼寫準確無誤。(二)雙語基礎：學生雙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欠佳，如用英語表達時語法錯誤多，漢語式的英語句子多。用漢語表達時則語焉不詳，或語言不符合漢語規範。英語通過強調後改進明顯，而漢語提高緩慢，尤其是中文寫作能力較差的同學很難在較短時間內趕上來。(三)修辭文體：由於翻譯課與高級寫作和修辭文體等課程不配套，學生在學習翻譯時尚未建立明確的文體意識。沒有修辭訓練和文體鑒賞的結果是，譯文隨心所欲，想怎麼譯就怎麼譯，完全不考慮遣詞造句的效果及其文體特點。有時口語、書面語混合使用，有時則把不同文體風格的內容放在一起。(四)不會使用工具書：經常有學生詢問某個單詞的拼寫或意義，詢問從工具書上輕易就能查到的背景知識。有的學生從袖珍字典裏查個詞義差不多的單詞就用，根本不查詞的用法及特點。以上這些通過嚴格要求和大量實踐都能有所改進。最難短時收效的是，不少學生讀書太少，不關心時事，知識面過窄，基礎訓練太差，甚至連漢語拼音和一些常識問題，特別是科技知識都知之甚少，這與我們的學生文理分科過早、中小學生過多埋頭於課程學習、課外閱讀量小面窄、大學生不注重學習方法的培養等諸多因素有關。

十幾年來，我們培養了一大批翻譯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這些人中有不少目前正與其他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中老年教師一起，活躍在翻譯教學的崗位上。翻譯課在外語院系應該算一門「重頭課」，別的不說，光是批改作業的工作量就相當大。儘管有的學校規定可以只改一部分，然而翻譯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與自然科學的作業不一樣，沒有統一的邏輯推理過程，沒有統一的計算公式，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每個學生都可能有不同的譯法、不同的困難和不同的問題。絕大多數翻譯教師寧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堅持全部批改作業以發現更多的問題。有的教師一周竟要批改百八十本作業！同時，因為沒有合適的配套教材，翻譯課教師無法像《大學英語》教師那樣有現成的練習冊和教師手冊，許多教師都是一面上課，一面找資料，一面編講義或修改教材，備課量非常大。加上有的學校為了使教師「達到正常工作量」，不管翻譯課的特殊性，讓翻譯教師與其他課教師一樣每周上課8小時甚至更多，這就更加加重了翻譯教師的負擔。可以說，每一名翻譯課教師都在超負荷工作。這一點同行之間相互理解，但更應引起學校當局的重視，採取相應措施，減輕教師負擔，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更充沛的精力去備課和批改作業，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教師的作用，有效地提高翻譯課

的質量。

很多翻譯教師都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從事一定的翻譯實踐與研究。我所熟悉的翻譯教師，幾乎人人都有譯著譯文發表，或為當地政府和企業翻譯過大量資料，或承擔過各類口譯任務，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並將這些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編寫成教材講義、用於課堂教學、作為研究例證。翻譯教師也大多願意承擔與所教課程關係密切的科研項目。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幾十年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與外國語言文學的其他方向如語言學或文學相比，翻譯學，尤其是翻譯教學的研究成果太少，與語言文學研究的進展和我國翻譯實踐的快速發展不成比例，嚴重滯後。這裏僅舉數例。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歷年立項課題匯編》記載，從1983年到1992年，共資助3889個項目，其中1058個為重點項目，2168個為一般項目。在這些項目中，屬於外國語言文學類的，「六五」期間的重點項目8個，「七五」期間10個，「八五」期間5個。在這23個重點項目中，22個項目是文學方面的，1項是語言學方面的，沒有一個是翻譯方面的。從1988年到1993年，在51個一般項目中，除2個翻譯方面的項目、9個語言學方面的項目外，其餘均為文學方面的。在28個青年項目中，翻譯項目1個，語言學項目5個，其餘均與文學或文化研究有關。也就是說，在103個外國語言文學資助項目中，翻譯研究只獲得3項，佔不到3%！在這僅有的翻譯研究項目中，一個是「西域翻譯史」，一個是「建國後17年英美文學翻譯概論」，一個是「從J. S. Mill “On Liberty” 的翻譯看異文化與思想的交流」。由此可以看出，翻譯研究中的許多內容都有待開發。這種不平衡狀況與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太低不無關係。一個三級學科與一二級學科相比，所得到的關注少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也是一個翻譯大國，擁有幾十萬之眾的專職譯員；翻譯課又是外語院系的必修課，每年有眾多的學子在汲取著傳統譯論的營養。難怪有人呼籲要提高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在翻譯研究中，翻譯教學又佔據一個甚麼樣的位置呢？筆者翻閱了八十年代以來國內一些外國語言文學刊物，發現除《中國翻譯》外，只能找到屈指可數的幾篇討論翻譯教學的文章。《中國翻譯》從1980年復刊至今的十五年中，有六年沒有開設「翻譯教學」欄目。在其餘年份中，一共刊登翻譯教學文章四十多篇，所佔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翻譯教師至今沒有機會坐在一起好好討論一下翻譯教學中的主要問題，如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翻譯測試、師資培訓等諸多方面。在外語教學中，精讀、泛讀、聽力、口語和其他基礎課與專業課的教材，每隔幾年就更新一批，翻譯教材卻是十幾年如一日。翻譯教師對此不是無動於衷，沒有看法，而是沒有機會來糾正這種偏差，甚至連在一起議一議的機會都沒有。在全國各類學會中，以翻譯教師為主體的組織似乎只有三個二級學會，即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翻譯研究會（1994年11月成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委員會（1994年12月成立）和剛剛成立的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理論與教學委員會。由於這三個委員會分屬不

同的一級學會，均有各自不同的學術活動安排和側重點，而翻譯課的任課教師往往工作量大，科研經費少，很難有機會外出開會，更不可能一年之間同時參加幾個會議，與廣大的同行交流切磋。因此我們建議，協調這三個委員會的活動計劃，在最近這幾年內，利用假期組織一次較大規模的翻譯教學研討會，專門研究翻譯教學中的各種問題，解決教學中的一些普遍性困難，促進翻譯教師對教學研究的關注。我們還建議，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開闢翻譯教學專欄，發動廣大的教師積極參與討論，定期刊登與翻譯教學有關的學術論文、活動信息、新教材評介等內容。俗話說，水漲船高，探討翻譯教學的論文數量多了，自然就會湧現出一批高質量的成果，促進對翻譯教學的研究，同時也引起有關方面對翻譯教學和翻譯教學研究的關注，增加科研投入，改善教學環境，獎勵優秀成果，提高翻譯教學的學科地位。

英語專業的翻譯教學情況大致如此，其他語種的情況怎麼樣呢？法、德、日、俄語這幾個「小語種」裏的「大語種」情況大概稍好一些，我們偶爾有機會與這些語種的翻譯教師交流，也能讀到他們的一些教學研究文章，還能了解到一點情況，其他「小語種」就很難說了。為了改進翻譯教學，提高翻譯的學科地位，各語種的翻譯教師有必要採取聯合行動了。

參考文獻

- 《外語界》編輯部(編)：《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參考資料》(上海：上海外語教學出版社，1990年)。
- 劉重德：《英語專業翻譯教學中的幾個問題》，《外語與翻譯》，1994年第1期。
- 劉潤清(編著)：《語言測試和它的方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年)。
- 付克：《論外語教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
- 穆雷：《用模糊數學評價譯文的進一步探討》，《外國語》，1991年第2期；《模糊數學評價譯文的再探討》，《中國科技翻譯》，1992年第4期；《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現狀及展望》，《外國語》，1995年第4期；《翻譯學與翻譯教學》，《中國翻譯》，1993年第3期。
- 范守義：《模糊數學與譯文評價》，《中國翻譯》，1987年第4期。
- 胡庚申：《怎樣學習當好譯員》(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勞隴：《翻譯教學的出路》，《中國翻譯》，1990年第6期。
- 楊曉榮：《翻譯教材中理論的進入途徑探討》，載《全國優秀英語學術論文集》(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5年)，上卷。